



爱泼斯坦作品集

我访问延安

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

I VISIT YENAN

EYE 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LED LIBERATED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 著 张 扬 张水澄 沈苏儒 /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爱泼斯坦作品集

我访问延安

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

I VISIT YENAN

EYE 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LED LIBERATED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 著 张 扬 张水澄 沈苏儒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 / 爱泼斯坦著；张扬，张水澄，沈苏儒译.

—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8

(爱泼斯坦作品集)

ISBN 978-7-5133-1859-4

I. ①我… II. ①爱… ②张… ③张… ④沈… III. ①通讯—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爱泼斯坦, I. (1915 ~ 2005) — 书信集 IV. ① I253 ②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3368号

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著；张扬 张水澄 沈苏儒 译

顾 问：黄浣碧

策 划：孙志鹏

责任编辑：孙志鹏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邵琳琳

版式设计：魏 丹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正文用纸：瑞典进口全木浆轻型环保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5.25

字 数：183千字

版 次：2015年8月第一版 2015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859-4

定 价：4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944年，毛泽东在接受爱泼斯坦采访之后，将一幅亲笔签名的画像赠送给他。至今，这幅画仍然挂在爱泼斯坦的家中。（本书《采访毛泽东》一文中详细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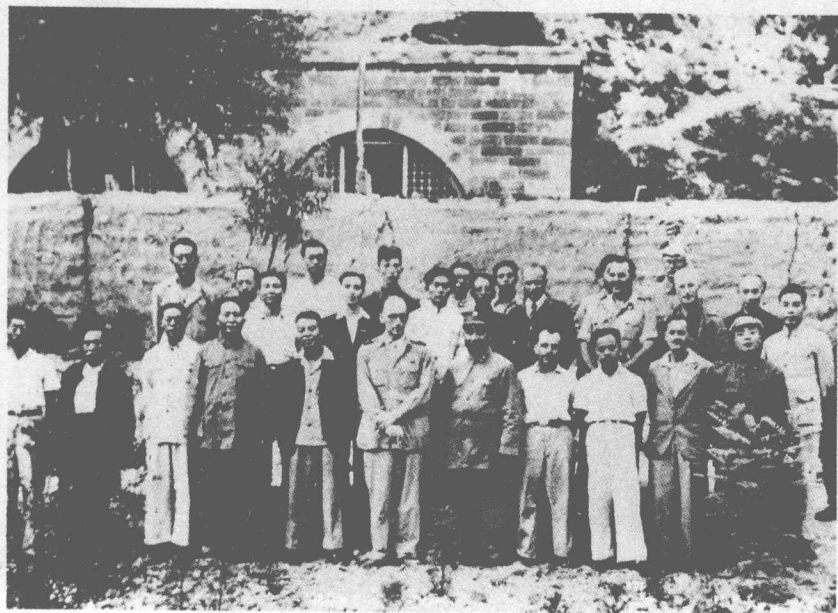


1944年在敌后采访的爱泼斯坦



在延安枣园，毛泽东主席接见来访问记者团中的六位外国记者。

后排右起：毛泽东、史坦因、夏南汗；前排右起：福尔曼、爱泼斯坦、普金科、武道。



毛泽东（左四）和朱德（左七）接见中外记者团所有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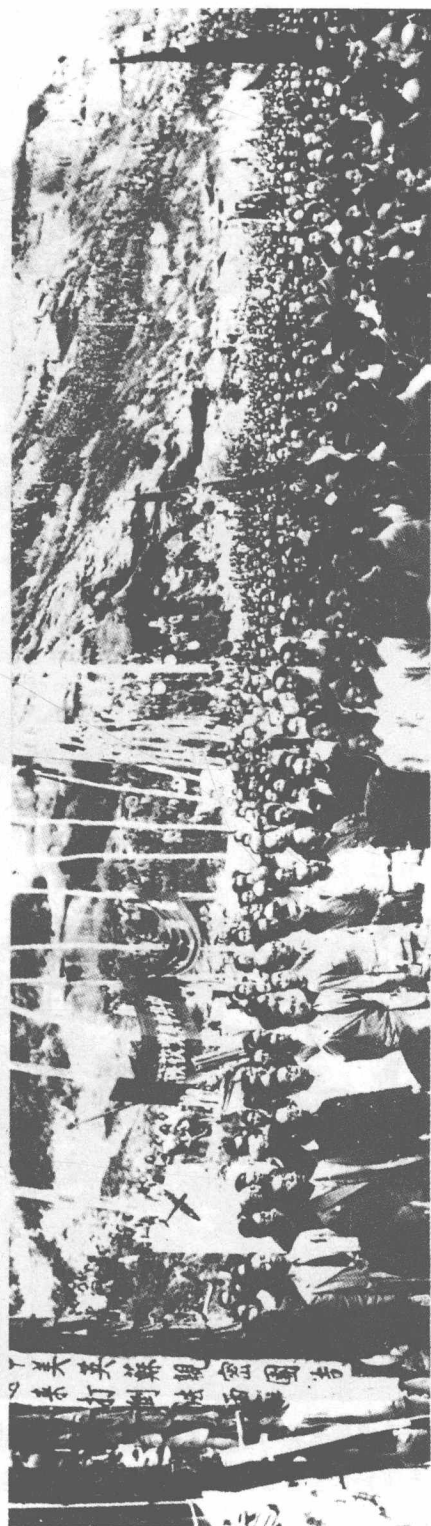
在延安王家坪，更多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见中外记者团。

前排左起：左二王震，左六朱德，左九周恩来，左十贺龙，左十一林彪。

后排右一为杨尚昆。前排左一为爱泼斯坦，左五为记者团团团长谢保樵。



1944年在延安边区第一位迎接记者团的王震（右），1983年在北京又和爱泼斯坦会面了。



中外记者访问延安期间，在延安文化沟举行两万五千人集会，庆祝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在晋西北，深入敌后战场的三个外国记者。左起：爱泼斯坦、武道、福尔曼。



1985年本书作者又来到晋北的关头村，这里曾经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第八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当天，全村老少出来欢迎作者。

序^①

1995年，在中国，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在全世界范围来讲，这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联合作战共同击败法西斯也已半个世纪。为了唤起人们永远牢记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的伟大意义，在我80岁诞辰之际，谨以我在1944年至1945年所写的简短通讯及家书合编成一本集子，作为我的一点贡献。这些通讯、家书都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延安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根据地发出的，是一个年轻的外国记者怀着对中国人民的事业和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强烈感情，根据其所见所闻而写的印象和评述。在年纪稍长一些的读者中，这些文字记载会重新唤起他们的回忆或给他们的记忆中增加一些东西。假如今天年轻的读者能从这本小集子里汲取一些在那个艰苦复杂但充满朝气的年代中我所见所闻的一些事物和思想感情，并对小集子中的叙述有一种新鲜感，我将无比欣慰。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序幕，对这个序幕不甚了了，是不可能了解这个时代的。

总的来讲，这本书收入了1944年5月到9月发往《纽约时报》的25

①【编者注】这是作者为本书中文版初版所作序。

篇通讯。当时我是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从重庆到延安和八路军根据地去的。书中还包括我当时写的其他一些文章和家信。参观团包括六名国际通讯社的记者和为数更多的中国报人及工作人员。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对世界舆论来讲，这是一次发现，一次重新发现，即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这种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的谎言和新闻封锁所掩盖。即使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之中的几个人已经深刻感觉到，这种力量才真正是世界大势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预兆，那就是即将出现的未来的新中国。这种处于萌芽状态下的力量，从埃德加·斯诺的首创篇《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范围里大放异彩以来，已经发展了几十倍。继斯诺之后，在1937年至1939年间，又出现了其他外国记者及访问者所写的水平上乘的目击者报道。自此以后的五年间，新闻记者及其他人对这些地区身临其境的接触被国民党重新颁布的交通封锁禁令所阻隔，一直到我们冲破封锁再次进入这些地区为止。

我们终于能够成行的部分原因是当年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不懈斗争的结果。但远不止那一个方面，因为当时有着一一种广泛得多的国内和国际氛围存在。对今天的读者来讲，简短回顾一下诸多其他因素是有裨益的。

在重庆，许多处于战火中国家的记者出于尽早打垮日军的愿望，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想去亲眼看一看并告诉他们的千百万读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作为同盟军的一员是如何有效地进行战斗的。一直否认这支部队在进行战斗的国民党当局则一再拒绝记者们的申请。延安却恰好相反，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明确表示，记者们不仅会受到欢迎，而且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包括敌后的前线，

以便对他们的问题取得第一手答案材料。这个答案不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重要，而且对整个亚洲战场同样是重要的。当时，在欧洲，战胜纳粹德国已指日可待；而在中国，日本正经过广西、湖南向贵州作最后的强有力的进攻，直逼重庆，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攻势下已溃不成军。这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借此就要攫取全中国，在德国战败后，还会把战争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呢？作为已经把日本人从以前称之为“占领区”的地方赶了出去的共产党人，他们宣称，他们领导的抗日力量已强大到不只保证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且在盟国军队把军事力量从欧洲战场转移到亚洲来彻底打败日军时，他们能够在与盟军进行有效合作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案对盟国政府和盟军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此，驻重庆的外国通讯社记者在一次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同国民党发言人毫无成效的辩论之后，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求助于驻重庆的外国的军事和外交代表们。

在所有这些压力面前，蒋介石政府才决定允许记者团出访，但作为控制手段，它又提出许多先决条件。其一是，记者团作为一个集体，应由一个国民党官员任团长，并包括一定数量的政府各宣传媒体的记者。第二个条件荒谬至极，即每篇通讯必须经过新闻检查，来自共产党的每一论点必须包含国民党的批驳之词。更有甚者，因为长时间不准记者访问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国民党坚持此次出访至少要三个月。可以想象，外国通讯社老板不会愿意让他们极少的宝贝记者如此长时间地去采访一个选题。从另一方面讲，时间拖长，肯定会给作为接待一方的共产党在物质供应和其他方面带来不便，从而会引发摩擦，而国民党的“团长”正巴不得利用这一机会极尽挑拨之能事。事实上，国民党果真这么干了。最后，由于规定了最少三个月时限的原因，大部分重庆的记者，特别是美国部队的特派记者，因正忙于采访

滇缅前线的美中联合军事行动，与此发生矛盾，结果除几个人之外，都不能成行，因而也阻碍了报纸给予他们太多的篇幅。

尽管国民党精心安排了种种限制，但记者团的出访确是一次突破。它使全世界充分了解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国民党试图在记者团抵达目的地之前，以其反共宣传的洪流湮没访问者们的设想，结果漏洞百出，由于做得太过头和手法拙劣，反而更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怀疑。而最为关键的是，记者们在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人们那种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念和朝气蓬勃的局面。相比之下，重庆则完全不同，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停滞不前，腐败不堪，消沉黑暗。结果，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形象的全部图谋彻底失败，解放区获得了巨大胜利；同时也预示了这些地区对外部世界开放的前景。

随后，美国军事观察团抵达延安。他们也深受感动，大多数人呼吁在抗日战争中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合作，提供援助。这一行动也受到了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赞同。这一局面由于后来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国而遭到破坏。这也是美国最高领导层决定自此只与国民党合作而采取的第一步。最后导致了美国全面支持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美中关系中断达二十多年之久。

现在让我回顾一下1944年6月间赴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团的其他方面。像国民党估计的那样，他们是少数，只有六个人。在这六个人中间，还有精心挑选的两个他们所信任的、站在反共立场唱反调的人。在最后一刻，他们不顾所有在重庆的记者们的一致联名抗议，擅自取消了另外一个记者、我的妻子爱尔茜·邱茉莉作为记者团一员的权利，她当时是受加拿大和英国报纸的委派，准备和我们同行的。提出的貌似公允的借口是，此行对一个妇女来讲，太艰苦了！其实是他们认为她倾向于共产党。

但是，尽管去的记者为数有限，他们却直接代表了总数两倍于他们人数的主要西方通讯社（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及苏联的塔斯社。其中有人身兼二职甚至三职。事实上，其中有三个人，哈里森·福尔曼（代表伦敦《泰晤士报》等）、我自己（代表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和毛里斯·武道（代表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不仅去了延安，还到了抗敌前线。他们不仅写了几十篇新闻报道和文章，在全世界报刊上发表，而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还出版了几本书。^①

谈到此行对我个人的影响，国民党“代表团团长”谢保樵，一个专挑毛病的人，怒气冲冲但却真实地汇报说：“艾培（爱泼斯坦的简称和爱称）一到延安，简直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这一“指责”在国民党高级官员董显光所写的书《中国和世界新闻界》里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从整体上看，这种“指责”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承认，即他的政府在宣传阵地上已经彻底败给了共产党）而通过此行使我确信无疑的是，正如我在给妻子的信中所写：“这个边区遭到包围封锁，但并不是一个可怜的地区，而是一个小型的国家，是许多地区的后方，把这些地区都加在一起，那就大了许多倍，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里的人民充分相信，他们就是中国，他们就是中国的未来。”其他的来访者也持有相同的结论，尽管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

收在这本书里的通讯，在用语和日期上一如我当年发稿时一样。因为身在中国，我没法从报刊上看到这些通讯是如何发表的。标题却

① 哈里森·福尔曼写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根塞·史坦因在延安作了详尽的调查后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以上两本书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我自己在同年编辑了一本小集子，题名《访问延安》，其中包括了在印度印刷并广为发行的、我为《纽约时报》写的通讯。1947年在美国又出版了一本较厚的书，名为《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其中选用了我延安之行的许多材料。

不同于报刊上刊用的，当这些通讯在印度被编辑出版为小集子时，我根据底稿重新写了标题。

在这本通讯集中还增加了我为其他报刊写的文章，也是以当年发表时的原貌出现。

最后，从给我当年蛰居重庆的爱妻爱尔茜·邱茉莉的信件中，我引用了不少材料，我相信这些信件可以补充和间接说明通讯中的一些情节。因通讯要经过新闻检查，为避免出麻烦，在用语方面有时比较迂回。信件则更自然一些，其用语也未变动，除去有些纯私人交谈和无关的话语略有删节外，为了语句的衔接，在措辞上略有改动。

这些书信也是我们记者工作的一部分，让我简短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吧。虽然爱尔茜·邱茉莉曾由几家报纸聘任与我们同行，而她却被重庆当局突然取消了资格。因此，在我们的通信中，我尽量把我对延安和八路军战场的印象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传递给她，告知她我们团里的情况，保持她的情绪，以帮助鼓励她尽量多地从国民党设置的各种障碍下得到我的通讯——那是她全心全意进行得很成功的一场战斗。虽然这些信件放在本书的偏后部分，读者如能按其日期或临近的日期把正文和通信对照着看，也许会发现有些用处。

令我高兴的是，所有这些材料和其他一些有关材料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动乱中保存了下来。这些材料同那个时代的环境、景物、感情很贴近。也可以说，那个时代是艰难的；而从另外的意义上讲，对曾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来的人来讲，延安又使他们充满了朝气，充满了热情和希望。

希望这本书有助于读者懂得是什么精神孕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认识到使这种精神继续下去的价值和必要。尽管国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仍须继续保持这种精神，使其具有新的活力，并进而保卫

它，使其真谛发扬光大。

〔作者补记〕在读这些通讯和家书时，读者应记住的一点是，这些通讯和家书主要传达了作者当年所察觉到的那种环境气氛和思想感情。从这方面看，不管是从个人或职业角度来讲，它们只是一些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有人讲过，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但只是一部分，因此还需要各个层面、更大范围的知识 and 纪实性文献来补充。

时代在变，习惯也如此。分别于1944年和1985年拍摄的、刊登在封面和封底的照片^①中，我嘴里都叼着烟卷。当了五十多年的“烟卤”之后，我到目前已经戒烟十年了。我发现这对我的健康有好处而对写作没有影响。吸烟的习惯，对年老、年幼的人都有害，我持反对态度。对吸烟的朋友们，我呼吁，像我一样戒掉吧！你会因此受益匪浅。

Israel Epstein

爱泼斯坦

1995. 1. 15

①〔编者注〕指本书中文版初版《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